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青年出版人
学术丛书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杨万里◎著

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

主编◎孙颙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杨万里◎著

上海青年出版人学术丛书

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

主编◎孙颢 副主编◎曹培章 总策划◎吴士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杨万里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

ISBN 7-5617-4793-4

I. 宋... II. 杨... III. 宋词-文学研究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2563号

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

著 者 杨万里
文字编辑 冯 奕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254千字
版 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一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7-5617-4793-4 / I·341
定 价 21.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序

李伟国

在唐末五代宋初的时候,词是朝廷官闱、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的雅玩,反映的主要是风花雪月、官闱起居和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少触及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且五代以前的词,大多是根据一般民间小曲填写的,形式比较短小,称为“小令”。词的形式和内容的大变化发生在北宋中期。吴曾《能改斋漫录》:“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歌唱,一时动听,传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仁宗朝是宋词发展的转折时期,同时的词作者,走着不同的路。有人认为,欧阳修还只能算是一位业余词作家,晏殊是半专业词作家,像柳永(耆卿)、张先这样的词人才是专业词作家。这不仅是因为柳永使用慢调,创制了许多新的词牌,更是因为他的词伴随着他的足迹深入到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此门一开,词的表现内容便大大拓展。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生活丰富,词以其特有的抒情手段与文体风格,恰逢其时地充当了表现这种新兴生活方式的最佳表现形式,而社会进步也推动了宋词本身的发展。经过柳永等人改造和再创造的词,也特别适合于铺陈和描绘,得心应手,情景交融。试举一例。东京金明池,原为教习水军之用,后承平日久,成了都城“娱乐中心”。柳永《破阵乐》渲染其盛况云: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时光。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编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

柳永之前鲜有能以词如此生动叙事者。宋真宗东封西祀,耗资极巨,一改宋初尚节俭之风,借盛大排场来显示皇室的威严,而柳永的《巫山一段云》组词五首实为“天书”事件之记录。

今杨万里的《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一书,分宋词与都市、节日、歌妓、市民四个

方面加以论述。认为都市建筑的华丽和都市生活的享乐气氛决定了部分宋词的艳丽性和富贵气等特征；宋词中的狂欢精神与宋人节日生活的纵情享乐有内在的联系，可以说宋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烈拥抱与赞美是宋词狂欢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歌妓对宋词的艳情性、女性化的风格、对词的实用功能和词的传播有较大的影响；产生于都市生活的宋词作为市民文学的一部分，其艺术精神与市民艺术趣味之间有着种种联系。这些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在研究宋词诸特征形成原因的同时，作者披阅了大量的宋代词作及相关的文学作品和史料，大量引用其中反映城市生活的代表作，而且细分为四大类五十余个方面。可以说，这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论著，文学作品与相关史料相印证，可给我等治史者以启迪，在历史研究中应注意挖掘诗词散文这座史料宝库，这座作为历史资料尚未被充分开发的金矿，一定能给史家以惊喜。

这部书是杨万里的博士论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出版协会鼓励和资助青年编辑出版自己的学术成果，于是这部论著就有了问世的机会。其实，这样一部有价值的专著，本来也是应该出版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项举措是有远见的。

三年以前，我曾冒昧为一位文坛前辈的文集作序，除了叙述敬仰之情以外，还借机表达了我的一个不易动摇的观点：

出版社是知识的中转站，是图书的制造者，在制造图书的过程中，出版人决不仅仅是被动的角色，他们的知识、才华和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价值的高下，甚至能引领读书的潮流。无论是过去和现在，许多文化名人曾经在出版社工作过，出版社也曾经出过许多文化名人，如大家熟悉的张元济、茅盾、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即是，而他们所在的出版社，又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情形的形成，当与出版社的上述特质有关。所以我一贯主张，在像我们这样的大型专业出版社里，要有一批为社会承认的学者、文人、名牌编辑、装帧设计家，等等，有了他们，出版社就能取得或策划出更多的好选题，就更容易与作者沟通，就更容易与读者沟通，就更具有权威性，就能做出更多的好书。编辑而又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成果，如果他是我们出版社的人，我一定会很支持他，因为尽管成果是他“自己”的，也总是我们出版社的人的，他的成果不仅可以为出版社争光，还可以使出版社更有吸引力。我一贯支持社里的员工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而且鼓励他们尽量带着论著去参加这类活动。我支持职工在本社发表自己的优秀成果。成果只论质量，不分内外。当然，对社里人的成果要求要更高一些。要知道，凡是优秀的文化成果，人家也是识货的，与其让别的出版社去出版，不如由我们

序

自己来出版,这样不仅可以“笼络人心”,还可以“夸耀社会”。也许有人以为,在自家出版社出书,总有“近水楼台”之嫌,还有可能被人看作“同人出版社”,有失公正。我认为关键还在于质量,只要质量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水平,久而久之,人们就不仅不会说闲话,还会羡慕不已。而那些在自家出版社出了优秀成果的人,还会以“优质资源”变成兄弟出版社的争夺对象。既得人,又得名,何乐而不为?

有几位出版界名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仍然很坚持,顽固地坚持。当然,不同意我的观点的出版界名人,可能是不认同有人给我套上的“学者”的光环。作为一个地道的编辑,我确实不敢自诩为“学者”。不过我仍然不想收回我的观点。

我谬踞出版社老总办公桌边多年,上面这些话,当然是在这个位置上有感而发的。如此说来,我的敢于在此作序,是因为我是一个干了大半辈子出版的老人了?倒也并非完全如此。巧的很,我本人对宋词和宋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踏上出版工作岗位以后,不知杨万里是否还在坚持业余的学术研究,希望他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也希望上海的青年编辑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

本书没有把所有宋词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它关注的是与宋代城市生活有关的那部分宋词。何以确定所论述的对象,即有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别哪些词是描写城市生活的词,而另外一些则不是?凡语涉香尘、高楼灯火、车水马龙之类,或写游宴、狎妓等城市生活内容者,均可断为描写城市之词。古代城市本不发达,能有以上景致者,决非乡村小镇。另如晏殊,数十年足迹不出京城,即使偶尔出知外地,所典也是名藩巨镇,故其词均可断为描写城市生活之词。其他情况,可依此裁定。笔者认为:这部分宋词是宋代城市生活的产物,它的内容、音乐、体制以及艺术精神,深深地烙上了城市生活的印记。本论文试图从宋词与都市、宋词与节日、宋词与歌妓、宋词与市民之关系,运用历史叙述法阐述以上观点。因此,很大程度上,本书是关于部分宋词的生活背景的研究。本文不再是从雅俗之别或文人词与市井词之区分来立论,而是从一种生活方式着手,消弥以上二者之裂痕,并研究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的某种内在关系。

文学研究的对象应是文学作品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学实践。因此,本书虽曰“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但立足点则在宋词,而不是宋代城市生活,此其一;城市生活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必须通过人的活动体现出来,所以本论文处处以人为中心,描述人(市民、文人、歌妓、民间艺人等)在城市时空中的行动,特别是与词有关的活动,此其二;城市生活不但影响词的内容,而且还影响词的传播方式,所以我们对词的理解不应局限在词的内容及其风格上,还应看到活跃在城市生活中的其他类型的艺术样式,如大曲歌舞、杂剧、踏歌、民歌、唱赚、南戏等,与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

本书的立意,乃基于对宋词研究史得失的考察。千年宋词研究,其盛有二,其厄有三。北宋后期、南宋前期之宋词研究,一盛也;清末民初之宋词研究,二盛也。第一兴盛期姑且不论,单就第二兴盛期言之,校词、刊词者有王鹏运、朱祖谋、陶湘、赵尊岳等;辑词者有刘毓盘、王国维、林大椿、周泳先、赵万里等;创词论者有郑文焯、况周颐等;民国以后,词学向现代学术转型,词之音乐文学地位得以重新确立,王国维、吴梅实任其功。其学术薪火,经龙榆生、夏承焘、任半塘、郑騫、唐圭璋诸先生相传相授,于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代词学研究者身上重放异彩。然词学之盛,其功不抵词学之厄。明人混淆词曲界限,厄之一也;清人妄订词谱,混淆诗词界限,厄之二也;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知未成,旧学尽废,庸俗社会学进入宋词研究,厄之三也。前二厄不论,仅以第三厄言之:人云亦云、观念先行、价值判断置于清理历史事实以及学理探索之上,何其普遍与流行!其实,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来说,史学家选择或陈述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其行为本身就是某种意义的体现。我们一旦进入宋词的具体环境,就可发现,我们长期以来认可的一些观念和看法,原来只是出自片面印象或人云亦云,今举三例说明之。

例一,有一段话是词学研究者经常引用并作为事实证据来使用的:

迨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词源》卷下)

后人遂据以认为:大晟乐促进了词乐的发展,周邦彦任大晟府时发展了词乐,特别是慢词。然而,张炎所述并不准确。大晟乐属古音古调,在当时是作为雅乐而不是俗乐面目出现的。大修礼乐之事,历来发生在天下大定或太平日久之盛世。大晟乐议之起,亦不例外。《宋史·蔡京传》载:“京每为帝言,今钱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正雅乐”条载:“(崇宁)三年正月甲辰,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今钱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以门客刘曷为大司乐,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此大晟乐议之起因。大晟乐果属雅乐?俗乐?《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载:“(崇宁四年)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乃下诏曰:‘礼乐之

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崇宁五年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同上)大晟乐为郊庙雅乐已明白无误。盖大晟乐之起,乃群小鼓吹“豫大丰亨”、怱怱徽宗追慕尧舜、粉饰太平之结果。其时天下承平既久,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举国上下一片祥和之气,于是起楼台,建道观,兴花石纲,造作不息,熙熙然恍如身处尧舜之世矣。蔡條《铁围山丛谈》卷二云:“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昇平极盛之际。”其风气可想而知。有必要补充说明,古人一向抱有复古思想,上古三代太平之治是历代君王追求的目标,其标志就是礼乐之治。行古礼、复古乐是每一个太平君主必举之事。就徽宗而言,铸大晟乐只是其追慕尧舜之治的一个方面(尧有“大章”,舜有“大韶”,故徽宗赐崇宁新乐曰“大晟”。晟,光明、兴盛之意),同时还有复古礼之举——强制推行《五礼新仪》。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载:“先君言,蔡京设制礼局,所费不可胜计……又颁五礼新仪,置礼生,令举行。而民间葬丧婚姻,礼生则执之曰:‘汝不用五礼新仪,我将告汝矣。’必得赂乃已。民庐陋陋,初无堂寝陞户之别,欲行之亦不可得。”《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四十八《开封府申请五礼新仪节要并前后指挥使更不施行》中也表达了新定古礼在民间难于施行的情况,故宣和元年即罢。1956年杭州郊坛发掘宋窑址一座,内有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产品甚多,这些用具均为朝廷而产,可知当时风俗。

然大晟乐与词乐果无关系欤?曰:不然。徽宗好大喜功,意欲以大晟雅乐取代世俗之宴(燕)乐(当时世俗新兴词乐有“淫哇”之不良名声),于是诏令大晟乐施于宴会,禁止其他淫哇之声。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音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诩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又,“(政和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亲按宴乐,召侍从以上侍立。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宴享,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五声既具,无沾滞焦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于是令尚书省立法,新徵、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有谱,依此;其宫、商、羽调曲谱自从旧。”“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俱见《宋史·乐志》)可知大晟乐确曾施于教坊宴乐。问题就在此:大晟乐乃魏汉津装神弄鬼

炮制而成之仿古雅乐，奏之远不及教坊乐之优美动听，总有一种“落韵”之感。当时即招致多人抨击，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宋史·乐志》），独蔡京、刘昺神之不已。蔡京虽不懂音律，然迎合上意，一意孤行，《避暑录话》卷一云：

崇宁初，大乐缺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大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蔡鲁公亦不喜。襄授之尝语予，云见元长屢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终声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招众工按试尚书省庭，使仙现在旁听之。乐阕，有得色。问仙现：“何如？”仙现徐前，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众坐不觉失笑。

《宋史·乐志》载：

政和末，蔡攸提举大晟府，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即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传于世矣。

姜夔《徵招序》称：

《徵招》、《角招》者，政和间大晟府尝制数十曲，音节驳矣。予尝考唐田畸《声律要诀》云：“徵与二变之调，咸非流美，故自古少用徵调曲也。”……故大晟府徵调兼母声，一句似黄钟钧，一句似林钟钧，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语。予尝使人吹而听之，寄君声于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浊者下而遗，万宝常所谓“宫离而不附”者是也。……只可施于琴瑟，难入燕乐。故燕乐缺徵调，不必补可也。

综合上述可知：大晟乐（包括增补之徵、角二调）乃政宣之际权臣以行政命令推行、群臣望风附和之结果，声律本未谐和，知音之士咸不与，而制乐者乃二流乐工。其音节驳杂，难施于燕乐。在实际演奏中调不成声，所以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因此之故，大晟府实际只存在了15年（崇宁四年九月（1105）至宣和二年八月（1120））。大晟府虽于宣和七年十二月彻底废除，但宣和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使大晟府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在其实际存在之15年内，崇宁四年至八年大晟乐尚处于调试阶段，直到政和初，才召令大晟府用大晟律（见《宋史·乐志》），所以严格讲来，大晟府之对宋乐之实际影响，仅政和初年（1111）至宣和二年（1120）共10年的时间。总之，大晟乐是北宋君臣自欺欺人、违背音乐规律而炮制出来的“大雅之声”，整个造乐事件是以蔡京为首的官僚集团上演的一幕闹剧：徽宗皇帝借此以自比尧舜礼乐之治，希以垂名千古；在朝者欲固位，在野者欲进用，“知其不可而为之”，各怀打算，假

戏真做。正因为大晟乐乃仿古之乐，其音未谐，所以南宋无人按其谱填词（按：姜夔所作徵角调与大晟乐无关）。

周邦彦提举大晟府之事对他作词并无影响。《宋史》周邦彦本传谓“擢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真定，改顺昌府”。清真何时提举大晟府？“未几”是多久？发生在何时？因何原因？传中并未说清。后人也没有深究。其实，清真提举大晟府与不久即罢之因，《鸡肋编》卷中说得很清楚：“周邦彦待制为刘曷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曷无以报之。因除户部侍郎，荐以自代。后刘缘坐王寀（道辅）妖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职，罢知顺昌府宫祠。周笑谓人曰：‘世有门生累主子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主子所累，亦异事也。’”查刘曷除户部侍郎在政和六年（1116），王寀妖言事发生在重和元年（1118）（《宋史》本传）；又据《挥麈余话》卷一载，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不久青溪方腊起义爆发（1120年），邦彦四处逃命。是知周邦彦提举大晟府在政和六年（1116），其时年纪已六十余；罢知顺昌府即在1118年，提举大晟府为时甚短。（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中已指出：宋官职中大晟府并无提举官一职，所谓“提举大晟府”即担任大晟府大司乐。刘曷任户部侍郎前即担任此职，周邦彦所接替者亦大司乐。）其时周已垂垂老矣！《浩然斋雅谈》载：“（上）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联系周邦彦一生经历及人生趣向（虚静好道），周密这个记载是可信的。王国维谓清真无一词谀世，信然。

例二，制订词谱是古代词学研究者长期投入精力较多的一项工作。现在看来，其意义并不大，鲜有成功者。其失有数端：误将元明戏曲之严守字声与宋词之用字等同；误将词之声韵与词调旋律看成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东西；将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与作为案头文学的词相混谈。然词谱之属在今之学人中间仍颇有市场，不可不辨其一二。

《钦定词谱序》称：“夫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否则音节乖忤，体制混淆。”其具体作法，则见于《四库全书总目·钦定词谱》提要，该提要云：“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自《啸余谱》以来，皆以此法推究，得其崖略，定为科律而已。”《啸余谱》十卷乃明人程明善所作，内有词谱三卷。其实，在程氏以前，更有张缙《诗余图谱》三卷流行，以为作词之指南。明清两朝制谱法基本相同，所不同者后出转精，愈出愈密。以这种方法来理解宋词，实于宋词神理气味概未之见，不得宋词真面目。宋人于先作曲后填词之作词法尚且反对^①，更无论明清人作词

谱以为填词之指导。明清人所倡导之依词谱填词正是宋人极力反对之作词法。张炎《词源》卷下“音谱”条谓：“述词之人，若只依旧本之不可歌者，一字填一字，而不知以讹传讹，徒费思索。当以可歌者为工，虽有小疵，亦庶几耳。”明清词家何得不参此语！所谓“可平可仄”，所谓“又一体”，其实是宋人作词下字用韵较宽之结果，亦是同一词调唱法多变之结果。宋人在词中屡屡提到偷声、减字、添声、添字、摊声、摊破等术语，而并不认为乃“又一调”。如杨无咎《雨中花令》咏歌妓之唱云：“慢引莺喉千样转，听过处，几多娇怨。换羽移宫，不顾人肠断。”赵福元《鹧鸪天》词云：“腔子里，字儿添，嘲撩风月性多般。”由此观之，明清人误解宋词深矣。总的看来，明清人对宋词的理解，并未超出宋人已有之评论，然今之治宋词者，动辄引明清人词论论述宋词如何如何，早堕第二义而浑然不自觉。

例三，现代词家往往把“令”、“慢”、“曲破”、“中腔”、“嗩子”、“三台”、“踏歌”等术语与词调之名或词体之名相联系，并承袭明清人旧说，以为短调小词即为令词，中长调词即为慢词。人云亦云，竟成词学常识。殊不知，以上术语只不过是宋人歌法之特殊标记，与词体、词调并无必然关系。明清人刻词，不懂其理，遂将每首词调下之歌法标记连刻，于是《黄河清慢》（晁端礼词）、《拜星月慢》、《浪淘沙慢》（周邦彦词）之类词调名便出现了，其实宋刻本《闲斋琴趣外篇》、《片玉集》中，以上诸词均无“慢”字。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第二章《词调》早已提出应从音乐上而不是从字数多寡上分令与慢；后来谢桃坊先生在《〈高丽史·乐志〉所存宋词考辨》（1993年《文学遗产》第2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令乃急拍唱法；慢乃缓拍唱法，与词之长短无关；破子乃柔声繁碎之声腔唱法，唱时伴以舞蹈；中腔乃中音迂徐缓慢之唱法；嗩子是促口带嗟叹音的唱法，用以表达特殊之感情；三台乃三十促拍之乐曲；踏歌乃歌唱时连手而歌，以足踏地为节拍。音乐、舞蹈、戏剧等经常出现“礼乐失而求诸野”的情况，日本所保存我国之唐乐，越南所保存我国之早期戏剧，已为人熟知；宋词之唱法标记保存于朝鲜古史中，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注意。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乃是因研究者缺乏历史意识所致。任何文化成果，如文学、哲学、艺术、建筑等，都有其自己的历史视野（the horizon of a text），即，它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时刻和人的历史存在中产生出来的。而每个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先见（the horizon of the subject），于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视野或历史背景。问题就在于：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先见，但我们又不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理解作品。研究者（或称诠释者）要达到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就必须使这两种视野能够融合，否则就会产生误解，乃至歪曲历史。误解产生之原因大致有：前理解（又称偏见），遮蔽，文本的残缺。以明清人误解宋词之因言之：宋词音谱之失传即所

谓文本之残缺也；以为词乃长短句之律诗，对词体之音乐文学性质一无所知，即所谓先见也；元明北曲及戏剧极盛，词道衰落，导致后人知之不详，即所谓遮蔽也。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研究者缺乏应有的历史意识的结果。

类似的问题举不胜举。如对柳永创新声的理解，流俗的观点认为柳永词中多新调（僻调），是因为他在中举前长期混迹于市井生活，广泛接触民间音乐的结果，而日本学者宇野直人先生通过深入研究，发现柳永的僻调（新调）词大多作于他任地方官时，而他做举子时所作词，大都是市面上流行之词调^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作为举子的柳永，如要获得时人的承认，就必须迎合市民趣味，选调作词时应尽量做到便耳可歌，故多选酣熟之词调；而作为地方官之柳永，其身份则是词坛权威，此时多作新调者，正因其作词多有示范作用故也。又如时下词学研究者对词曲关系的理解，下者或以为宋词过后是元曲，其递变发生在南宋后期或宋末元初；高者或以为南宋词之雅俗分流，南宋俗词入元流变为北曲。其实，词曲递变，自北宋已然；至于北曲之形成，其源则应到辽、北宋与金之文化交流事实中去寻找。此一最简单之历史常识竟常为治词学者所忽视，良可深叹。

三

7

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史学研究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还是陈寅恪的古典今典说以及文史互证法，都是史学方法引进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风情特别是都市生活成为我国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并出版了很多研究著作和发表了很多相关研究论文。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型既是受国外理论（如法国计量史学、年鉴学派）影响的结果，又是在我国自80年代起新一轮城市化浪潮冲刷下史学界作出的本能反应。80年代史学界对古代生活史的关注，直接影响了古典文学界对市民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小说和戏曲得风气之先。相比之下，对带有浓厚城市生活烙印的宋词的研究，在这方面显得非常滞后。

在诸多方面，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息息相关：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宋词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为宋词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传播者；繁荣发达的市民艺术与风靡于世的宋词形成互为影响和促进的关系；从词乐来看，燕乐固然是词乐的主流，但燕乐不是词乐的全部，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宋代，词乐已包括军乐、道教音乐、民间新兴曲艺音乐在内了。这些音乐怎样进入宋词的？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宋词中祝寿词、节序词为何这样发达？

与当时习尚有何关系？唱和应酬之词与文人（他们大多住在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之间有何关系？都市词中所反映的城市经济规模、文艺形式怎样？我们应当从一种新的角度，在雅与俗、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建立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宋代的城市生活。（注：在本书中，“城市生活”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其范围大致与市井生活概念之范围等同，但还包括与市井生活有关者，如部分宫廷生活、文人生活乃至都市中僧寺道观在市民生活中的作用。）

8 目前对城市生活的研究，大都对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精神上的世俗化投入了较多的关注。本书取“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这一角度，并且对城市生活的描述在论文中占据一定比例，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宋代词人精神上世俗化的社会背景，因为宋词从本质上讲是宋代的世俗文学。世俗化也即平民化，在艺术上，它要求艺术创造者、欣赏者及其艺术形式、内容、形象的一系列新变化。宋词中价值取向的世俗化，表现之一是主体性价值观的萌芽（自我肯定），即按自己认可的方式去生活（如第四章对柳永精神世界的分析，与它相对的一面是对象性价值观，即通过群体对他的肯定来实现自我价值）。然而过分的世俗化可能会带来大众精神信仰的迷失，故宋代文人如苏轼等，力主词须雅化，使词回到诗的传统：抒情言志。过俗之词之所以会引起统治者的反感与抵制，其原因也即由此。然而，我认为传唱于宋代市民之口的民间词才是活泼的、开放的艺术，正因为有它，才有柳永、周邦彦等词人；正因为有它，宋代众多的说唱艺术（鼓子词、转踏、诸宫调、小唱、说话等）才会有如此绚烂之色彩；正因为有它，才会有南北曲之兴……而雅词无论是从创新性还是从抒情性（这两点才是衡量文学成就最主要的标准）来讲，它们远不及前者，更不及唐诗。苏轼对词体的改造，恰恰是以牺牲词体固有的音乐性和宛转近情的特征为代价。可惜的是，历代文人狃于习惯思维，对宋代俗词之重大意义认识不够，对之多加删汰，致使今存宋词绝大部分呈现出文人面目，曾广布于宋人之口的宋代民间词，反遭掩盖，从而使后人（尤其是今人）对宋词总体面貌缺乏了解，也导致了一些意义并不大的争论，如豪放、婉约之争。

四

马丁·哈威特在《宇宙学的发现》（1981年）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在科学发现上所做的诸多努力，都遵循着一个模式，无论是各种昆虫的发现，还是为寻求新大陆和岛屿而进行的海洋探险，或者是探测石油在地层中的储藏。当它们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从事某种探险时，发现的速率开始上升；但是用不了多久，新发现减少了，发

现的速率降低了,即使采用一些新方法也无济于事,研究逐渐走向终结。人们可能会偶然发现一个先前忽略了的细节,或者会遇到一个很罕见的特殊情况,但发现的速率依旧快速减小,接着大河变成涓涓细流,昔口高涨的热情冷却了,研究者离开了这个领域,事实上它已不再富有活力了。”^③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恰好可用来概括当前宋词研究界之现状。上世纪宋词研究曾走过一段辉煌的路,这在近几年发表的几篇“词学研究百年回顾”之类的文章中略可感受到。然宋词研究在近十余年以来,已经开始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词学研究者纷纷转向清词,并以抢占滩头阵地的形式迅速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相形之下,曾经是人才济济的宋词研究界,现在可谓精英消歇,正如《易经》中所说“群龙无首”,《圣经》中所谓“*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以色列已没有国王)。当我面对这门曾经有过深厚积淀的学科时,首先想到的是:我现在该采用什么样的写法?昔观叶适《习学纪言》、王船山《读通鉴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等书,慕其能从历史演变中推求时代心理,进而指出学术之流变、世风之升降。为文之道,于斯化矣!众所周知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名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④曾激起不少学者的学术梦想,我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此类视野宏观、思理深邃之文,因为我深深知道,学术的价值最终还得靠它在理论探索方面的成就来确立;但学植既浅,理论素养又差,未敢轻易动笔。

于是,我在本书中选择了“一种历史的叙述法,往往叙述即是论点的表达”^⑤。研究历史,首先应进入其情境中,研究具体的过程,傅璇琮先生曾说:“我认为首先是要清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历史研究的任务,有一点却被许多人所忽略,那就是要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历史上的一个个事件,一次次潮流,历史人物的种种活动,其真相究竟如何?它的来龙去脉,它的矛盾的各个侧面,其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对于文学史、思想史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也是重要的。”^⑥本稿在这方面处理是否得当,幸读者教之。

最后,将本书的结构构想交待如下:第一章总体上介绍宋代城市发展的概况,俾读者有整体印象,第二章乃从空间顺序上谈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的关系,第三章乃从时间顺序上谈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则从城市生活中与宋词有关的文化主体——歌妓、文人和市民——来谈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样,构筑起观察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之间关系的立体框架。

附注:

① 《侯鯖录》卷七载王安石语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

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宋史·乐志五》记绍兴四年国子丞王普之语云:“自历朝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类似的看法还见于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 ② 《柳永论稿》,[日]宇野直人著,张海鸥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6 页。
- ③ 引自《科学的终结》,[美]约翰·霍根著,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8—159 页。
- ④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丹麦]勃兰兑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一分册引言。
- ⑤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美]汤普逊著,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前言。
- ⑥ 《五代诗话》,[清]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美]李珍华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 页。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	1
二.....	2
三.....	7
四.....	8
第一章 宋代城市发展概况	1
第一节 宋代主要城市概览.....	1
第二节 坊市合一新型城市格局的形成.....	6
第二章 宋词与都市——以东京和临安为例	12
第一节 金明池、西湖.....	14
金明池.....	15
杭州(临安).....	17
西湖.....	20
观潮.....	22
第二节 市楼、歌馆、名园.....	23
市楼(酒楼).....	23
茶坊.....	27
歌馆(妓馆).....	28
名园.....	30
第三节 佛寺、道观.....	32
佛教之盛.....	33